

巴蜀符号述论

严志斌 洪梅

关键词：巴蜀符号 四川盆地 战国初期至西汉早期 组合 方向

KEYWORDS: Ba-Shu Script Sichuan Basin Early Warring States to Early Western Han Assemblages Orientations

ABSTRACT: The trimming of the archaeological data available to date reflected that the Ba-Shu script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strip-shaped zone in the west of Sichuan Basin centered by Chengdu Plain and the Three Gorges area from Chongqing to Zhijiang. The 272 characters of Ba-Shu script include human-shaped, animal-shaped, plant-shaped, utensil-shaped, architecture-shaped, geometric types, etc., the dates of which are from the early Warring-States Period to the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Ba-Shu script has some special compound assemblages, the importance and complexity of the orientations of which are coexisting, and the discussions on them should be associated with the functions of the utensils bearing them. No ethnic and racial differences have been found on the characters of the Ba-Shu script, but it cannot be excluded that they have tribal or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在四川、重庆地区的战国秦汉时期器物上，常见有一些图形符号，与平常所见的纹饰有异，又与汉字不同。这类符号，学界多称之为巴蜀符号。古文字特别是对死文字的解读，是学术界的重大课题，巴蜀符号是其中的难题之一，也是目前尚未明确其性质与含义的符号系统。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将有助于巴蜀古文化的重建与理解。巴蜀符号是川渝地区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研究的停滞不前，又限制了这一地区此时期考古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细化。

70多年来，巴蜀符号的资料已积累了不少，其所处的考古背景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川渝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学年代与文化框架基本建设完成，这无疑有利于巴蜀

符号研究的开展。到目前为止，不少学者曾对巴蜀符号进行研究，并在诸多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巴蜀符号资料的收集整理方面，1942年，卫聚贤进行了初步整理，公布了48种纹饰符号^[1]。1978年，刘瑛撰成《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2]，1983年又加辑补，是当时巴蜀铜器纹饰符号的集大成者。1998年，高文、高成刚辑成《巴蜀铜印》^[3]，收录巴蜀铜印122件。2011年，管维良出版《巴蜀符号》^[4]，收录大部分出土巴蜀符号并对部分符号进行讨论。巴蜀符号的分期断代方面，一些论著涉及巴蜀文化或墓葬分期，但少有专门论及巴蜀符号者。1991年，罗开玉在对巴蜀文化或墓葬分期的基础上，把巴蜀符号分成了五期^[5]。巴蜀符号的特点

作者：严志斌，北京市，1007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洪梅，北京市，100006，中国国家博物馆。

方面，主要认识到象形符号占绝大多数，还有一些比较抽象的符号，这些不同可能有音、形方面的区别^[6]。巴蜀符号的性质方面，学术界分歧很大，如名称就有“巴蜀文字”^[7]、“巴蜀图语”^[8]、“巴蜀符号”^[9]等，准确名称需要对巴蜀符号全面厘定后才能作出判断，所以本文也暂以“巴蜀符号”作为指称。

此前研究巴蜀符号的论文，有的将重点放在了对符号的释读上，将巴蜀符号与甲骨文、金文或民族文字如彝文、纳西文进行对比释读，或根据符号的象形物进行猜解，虽然也提供了研究的视角，但研究方法与研究指向上显然存在问题。而对巴蜀符号的分类、内容、特点、规律、载体和材质与符号的对应关系等方面虽都有讨论，但迄今为止，对巴蜀符号的研究尚待进一步推进。

对巴蜀符号进行系统研究，应当充分使用数字化统计分析技术，调整研究范式，先厘清每一种每一类巴蜀符号的特征、变化、组合、地域、年代，才能考虑进一步的研究与解读。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对有巴蜀符号的器物重新进行尽可能细致的分期断代研究，综合考虑这些铸刻有符号的器物并参考共出器物进行统计，重点分析同一器物上的符号组合规律，以尝试推求其语言学特征。分析符号在不同时段、不同地域的分布、变化，以推求其在不同时空维度的特征。分析符号与其载体性质的对应关系，如不同的材质、用途和社会层级。如此才能尝试回答巴蜀符号的性质、内容、分类、特点、规律等问题。

一、分布地域

曾有学者统计，有巴蜀符号的器物的出土地点主要在重庆、四川、鄂西、湘西和陕南^[10]。资料已经发表且有明确出土地点的遗址主要有四川成都市白花潭^[11]、白马寺^[12]、琉璃厂^[13]、羊子山^[14]、簸箕街^[15]、光荣小区^[16]、圣

灯村^[17]、金沙巷^[18]、金沙遗址^[19]、京川饭店^[20]、凉水井街^[21]、青羊小区^[22]、商业街^[23]、新一村^[24]、石灰街^[25]、石人小区^[26]、金鱼村^[27]、省水利设计院^[28]、外枣子巷^[29]、石人坝^[30]、无线电机工业学校^[31]、青羊宫^[32]，蒲江县飞龙村^[33]，宝兴县汉塔山^[34]、厄尔山^[35]，大邑县五龙乡机砖厂^[36]，罗江县周家坝^[37]，峨眉县柏香林^[38]，高县黄泥坳^[39]，广元市宝轮院^[40]，犍为县万年第村^[41]、五联村^[42]，简阳县糖厂^[43]，越西县华阳村^[44]，芦山县升隆乡^[45]，茂县牟托村^[46]，绵阳市涪江沿岸^[47]，绵竹县清道公社^[48]，彭州市太平乡^[49]、红瓦村^[50]，郫县向阳大队^[51]、独柏树^[52]，渠县城坝^[53]，什邡市城关^[54]，石棉县裕隆村^[55]，双流县青桐村^[56]，新都县马家公社^[57]，新津飞机场^[58]，宣汉县罗家坝^[59]，仪陇县新政镇^[60]，屏山县沙坝村^[61]、田坝村^[62]，荥经县同心村^[63]、南罗坝村^[64]、自强村^[65]、古城村^[66]；重庆九龙坡区冬笋坝^[67]，北碚区庙嘴^[68]，涪陵区小田溪^[69]、江北点易^[70]，开县余家坝^[71]，万州区新田乡^[72]、麻柳沱^[73]、大坪社^[74]、曾家溪^[75]、高粱村^[76]，云阳县李家坝^[77]、帽盒岭^[78]、东洋子^[79]，丰都县白沙公社^[80]；湖北巴东县红庙岭^[81]，荆门市罗坡岗^[82]，宜昌县前坪^[83]，枝江县杨家垱^[84]，秭归县兵书宝剑峡^[85]、归州镇^[86]、沙包岭^[87]、中口镇^[88]；贵州赫章县可乐乡^[89]，沿河县神坝渡^[90]；云南绥江县酒房沟村^[91]，水富县张滩^[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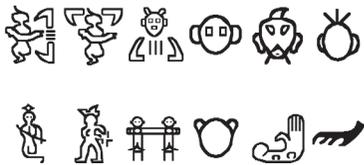
另外，湖南张家界市熊家岗^[93]、凤凰县岩六屯村^[94]、桃江县杨家湾^[95]，陕西西乡县望耕台^[96]，贵州松桃县木树乡^[97]，湖北利川市忠路镇^[98]、咸丰县墨池寺村^[99]等遗址出土的铜罍于上有一些图像符号，与四川地区出土战国时期罍于上的符号虽有相似之处，但区别也很明显，本文暂不将其纳入巴蜀符号范畴。在四川、湖南、湖北等地还出土有一批所谓“棘”字戈，因其性质特殊，本文也不将其归入巴蜀符号。

由以上可知，巴蜀符号主要分布在四川

盆地西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南北条状地带及重庆至枝江的峡江地区，与巴蜀文化的分布范围一致，但具体遗址点却比巴蜀文化遗址地点少很多。

二、种 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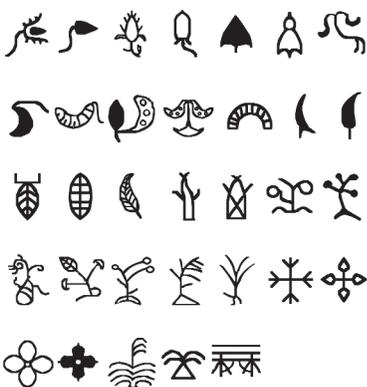
研究巴蜀符号，首要的问题是了解符号的种类和形态。已收集的272种符号可分为人形、动物形、植物形、器物形、建筑形、几何形等六类，其中人形符号有12种（图一），动物形符号有26种（图二），植物形符号有33种（图三），器物形符号有31种（图四），建筑形符号有20种（图五），几



图一 人形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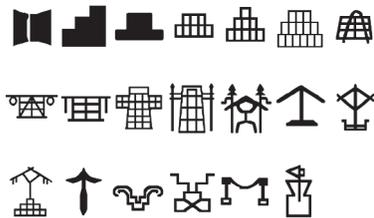
图二 动物形符号



图三 植物形符号



图四 器物形符号



图五 建筑形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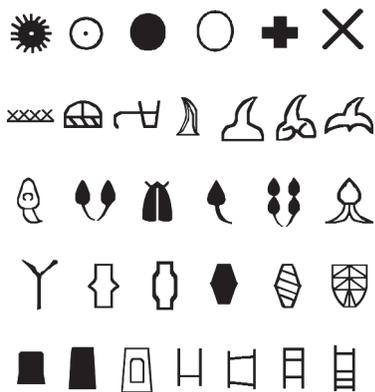


图六 几何形符号

何形符号有150种（图六至图一〇）。

有一些符号形制虽有差别，但通过组合也可以推断它们可能是同一种符号的异构。

- (1) 卩 - 卩 - 卩 - 卩^[100]。
- (2) 卩 - 卩 - 卩 - 卩。
- (3) 卩 - 卩 - 卩 - 卩 - 卩 - 卩 - 卩。
- (4) 卩 - 卩 - 卩。
- (5) 卩 - 卩 - 卩 - 卩。
- (6) 卩 - 卩 - 卩^[101]。
- (7) 卩 - 卩 - 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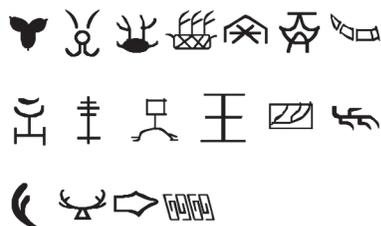
图七 几何形符号



图八 几何形符号



图九 几何形符号



图一〇 几何形符号

如此，可以将多个符号合并考虑，这有助于巴蜀符号研究的深入。但这种合并工作需要谨慎进行。

三、时 代

巴蜀符号的时代只能通过其所在器物进行判断。铸有巴蜀符号的器物绝大多数属于战国时期，少量可至西汉早期。

时代稍早的巴蜀符号，如出土于四川成都市金沙遗址“黄河”地点的铜矛（M535：1），骹部有蝉形纹样与形符号，M535的时代为战国早期偏早阶段。时代稍晚者，如出土于四川什邡市城关的西汉早期铜剑（M103：4），剑身有形符号。

三星堆文化多被视为早期蜀文化，目前能见到的经正式发表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有8个^[102]（图一一）。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下限一般认为是殷墟时期，如此则与流行于战国至秦的巴蜀符号有着巨大的时间缺环，而且三星堆遗址所出的8个刻划符号目前在战国时期的巴蜀符号内尚未见到同形者。因此，巴蜀符号的时代还不宜上溯到商代晚期。

成都地区一些春秋末期的铜器上有类似巴蜀符号的纹样，如金沙遗址星河路西延线出土铜剑（M2725东：34）上的纹样^[103]与巴蜀符号中的形符号近同，虽很可能是巴蜀符号的肇始，但其还应该是纹样。在巴蜀文化的铜罍上常出现一种船形符号，如重庆万州区甘宁乡高粱村甘宁坝西侧出土的铜罍于上有船形符号^[104]。类似的船形符号还见于东汉时期的铜罍于上，如湖南凤凰县千工坪乡岩六屯村石洼地出土铜罍于^[105]。东汉时期与战国晚期、西汉早期铜罍于上的符号相似，虽也可以看作是巴蜀符号的余绪，但其含义与组合却与巴蜀符号不同，这里也不将其纳入巴蜀符号系统。



图一一 三星堆遗址刻划符号

综上，巴蜀符号流行的时代基本在战国初期至西汉早期。

不同的巴蜀符号出现的时间也不同，如形符号流行于战国早期到秦并巴蜀之后^[106]，、形符号流行的时代为战国中期到末期^[107]，形符号流行于战国中期晚段到秦，形符号的流行时间为战国中期至汉初。就目前资料来看，巴蜀符号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出现与使用，其消亡也并不同时。

四、组 合

每件器物上的巴蜀符号都构成一种特定的组合。对巴蜀符号组合的研究，分析其组合规律，是尝试推求其语言学特征以回答巴蜀符号的性质、内容、分类、特点、规律等问题的必经之路。有关巴蜀符号组合方面的研究，王仁湘先生已肇其始^[108]。但进行组合研究需要在单个巴蜀符号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有些巴蜀符号的组合呈现出特别紧密的关系，一部分已成为固定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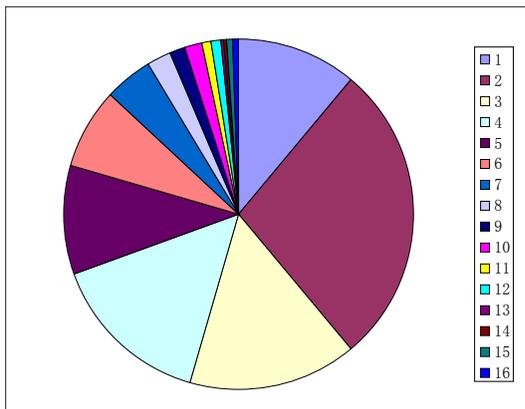
1.  -  笔者所见有形符号者共241件器物，有形符号者253件。形符号形成组合者有210件，在这两类符号中所占比例分别为87%和83%，应该是一个固定组合。

2.  -  在27件有形符号的器物中，形符号组合者有25件，所占比例高达92%。

3.  -  在出现形符号的31件器物中，26件是形符号组合，所占比例为84%。

4.  -  在出现形符号的29件器物中，以组合出现的有27件，所占比例为93%。

如此高比例，说明、、、符号组合是巴蜀符号的固定组合，而且组合的符号顺序相同。如果巴蜀符号构成了语言体系，则、、、符号组合很可能是固定的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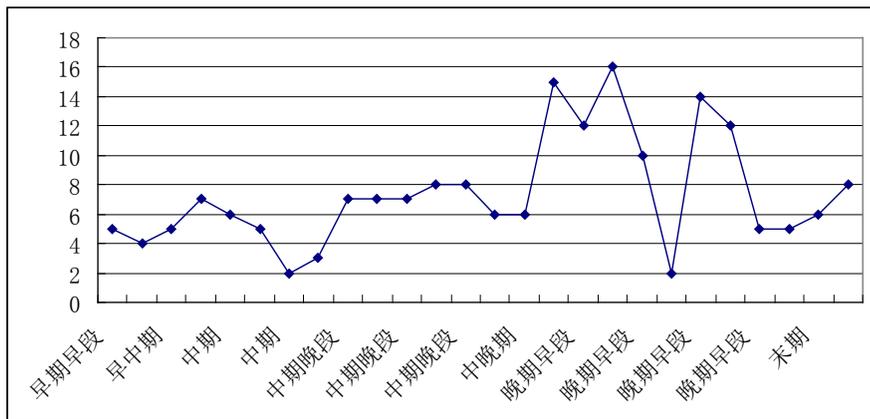


图一二 巴蜀符号组合数量比例图

语。另外，它们有可能是复合性符号，或可称“复式符号”，即、、、是各有特定含意的符号。若此，则对巴蜀符号的组合与性质将会有不同的理解。

在资料发表相对完整的774件有巴蜀符号的器物上，数量最少的为1个，最多的有16个，其中2~4个符号组合的总占比超过三分之一，10个符号以上组合者占比不超过5%（图一二）。

巴蜀符号组合的演变是由繁趋简还是由简益繁，这关系到我们对巴蜀符号性质的判断。从、形符号看，与形符号组合者最少有3个符号，最多有16个符号。战国早期不见形符号，从战国中期与晚期等两个时期看，战国中期与形符号组合的有2~11个符号，战国晚期有3~16个符号。鉴于有的器物上同一符号重复出现，因此从符号种类来看，战国中期有2~11种，战国晚期有3~15种，约略有渐繁的趋势，但不显著。与形符号组合的符号最少的有2个，最多的达16个。从时段上来看，战国早中期为3~8个，战国晚期中段为2~15个，以10个以上的多见，战国晚期末段为5~8个。如图一三所示，有形符号组合的符号数量在战国时期的变化趋势是先渐趋增加，到战国晚期早段最为繁复，到战国末期又呈现简化与减少的态势。总体来看，其他巴蜀符号的组合也呈现出类似的趋势。



图一三 有𠄎形符号的组合符号数量在战国时期的变化趋势

五、方向性

巴蜀符号的方向性，和符号本身结构与形态有关，是巴蜀符号研究中的关键和需要特别关注的。这个问题需要对所有巴蜀符号进行考察并对每个符号进行分析后综合来看。

分析巴蜀符号的方向性，一个可行的方案是先确定其所在器物的方向性。巴蜀符号主要出现在青铜戈、剑、矛、印上。先假定戈是胡朝下为正方向，剑与矛以锋向上为正方向，带钩在使用时为横置，钩首向左或向右不定。若出现人形，则以人头在上为正方向。另外还有一些巴蜀符号是广泛出现的，如为人所熟知的𠄎 𠄎，我们也假定𠄎 𠄎这样的布置是正方向。

在对𠄎形符号进行考察时发现两个有趣的现象。一是青铜矛上出现的𠄎形符号多为正方向。有两例矛上的𠄎形符号的方向不易确定，因为这两例矛的符号里出现有人形，若据矛的方向来看，𠄎形符号也为正方向，而据人形来看，𠄎形符号则为反方向。若不考虑人形符号的方向性，则所有矛上的𠄎形符号均为正方向。二是剑上的𠄎形符号均是反方向。若如此，则𠄎形符号的方向性不固定，即有正方向的“𠄎”，也有呈反方向的“𠄎”。𠄎形符号的方向与地域没有对应性，即同一地点出土的器物上既有正方向，也有反方向。从时代看，

战国中、晚期都有正、反方向者出现^[109]。

𠄎形符号目前只见于铜矛与铜剑上，关于其方向性问题，即何为𠄎的正向，可在矛、剑锋向上时进行对比。在12件铜矛中，绝大多数符

号方向与铜矛锋的方向相同。仅重庆李家坝所出的1件矛上𠄎形符号作𠄎形，其余11件皆作𠄎形，即横线在上、草形符号部分在下。在24件铜剑中，若剑锋向上放置，则𠄎形符号皆作𠄎形，即横线在下、草形符号部分在上。这种符号正、反向的情况与器类呈现出惊人的相关性，而与器物的时代、出土地域无关。

𠄎形符号在不同器类上的方向也不同。13件铜矛上的𠄎形符号皆与矛锋方向相同。7件铜剑上的𠄎形符号皆指向剑茎，与剑锋方向相反，即剑锋向上时，呈𠄎形。6件铜戈上𠄎形符号的方向有三种：位于援部朝向内的3件、位于内部向上的2件、位于胡部向上的1件。𠄎形符号在铜矛、剑上的方向与𠄎、𠄎形符号类似，皆在矛上与锋方向相同、在剑上与锋方向相反，即𠄎形符号应该以𠄎形为正方向。

同一巴蜀符号在矛与剑上常常互为反向。如𠄎、𠄎、𠄎、𠄎形符号，在青铜矛上多数是正方向，在剑上则都是反方向，如果剑锋向下放则为正方向。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这使得我们思考现在对青铜剑的方向性的认知与当时巴蜀人的认知可能是不同的。再以𠄎形符号为例来看，此符号在器物上有两种情况：一是作𠄎形，尖端弧曲向上；二是作𠄎形，尖端弧曲向下。这两种形态与其所在的器物种类有密切的关系。𠄎

形出现在铜矛、戈上，形只出现在铜剑上。如此，在战国时期巴蜀人的观念中，哪一种是这样符号的正常形态呢？从墓中铜剑的摆放位置来看，剑锋一般都是朝向墓主的脚部放置，也就是说当时人可能视剑锋向下为正常状态。在铜剑置于鞘的情况下，剑锋即朝下。如此，正方向亦为尖端弧曲向上，形态与铜矛、铜戈上的形符号一致。除铜剑在墓中相对墓主的摆放位置之外，铜矛与铜戈的摆放方式也可作为参考的标准，特别是四川大邑县五龙乡机砖厂墓地出土的铜戈（M2：20）^[110]，其戈援上的筭形符号即作尖端弧曲向上的形。因此，弧曲向上应该为此符号的正方向。这样，、、、形符号均为正方向。只是在一些情况下，剑上的、、、与形符号是互为反方向的。这也提示我们巴蜀符号方向性问题的复杂性。但确定一个巴蜀符号的正方向，始终是巴蜀符号研究必须的前提。

六、器物性

巴蜀符号出现的器类有铜印、戈、剑、矛、镞、铍、镞、刀、削、斧、钺、斤、凿、釜、盘、釜、釜甑、壘、钊、勺、豆、瓮、钟、罍、铎、梳、带钩、兽首饰、铜泡、耳杯、棺。有的符号出现在多种器类上，如常见的形符号。部分巴蜀符号似乎与器类关系密切，有的巴蜀符号只出现在特定的器类上。如、、、、、形符号，目前所见绝大多数出现在印章上（如有81例，只有1例出现在漆耳杯上）^[111]。、、形只见于铜矛、戈、剑上，、、形多见于铜矛、剑上。巴蜀符号在铜印与铜兵器两类性质不同的用器上的使用有比较明显的差别。所以，巴蜀符号的讨论应当与器用联系起来考虑。

七、族群性

巴蜀符号的族群性与地域分布有关。就

目前资料来看，大多数巴蜀符号既见于蜀人分布的成都平原地区，也见于巴人分布的峡江地区，并不能区分出巴人或蜀人专用的符号。也是基于此，本文以“巴蜀符号”作为指称。但也有一些符号，集中出现于某一个地点，如形符号，只见于四川新都马家公社战国木椁墓^[112]；形符号，目前只见于四川盆地西部的蜀人分布区。但大多数巴蜀符号，如形符号，既分布于蜀文化区，又在冬笋坝、宝轮院、同心村、小田溪等巴人墓地呈聚集性分布。总体上看，巴蜀符号似乎不具备更具体的民族或种族的族群性特征，但又不能排除其有一定的聚落性或地域性。目前对巴蜀文化聚落与墓地性质的研究不够全面，而巴蜀符号的族群性研究需在巴蜀人群聚落形态性质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得出结论。

以上从地域、种类、时代、组合、方向性、器物性、族群性等七个方面进行初步概括，意图呈现巴蜀符号的一些基本特征，以供学界参考。因为尚有许多巴蜀符号的资料没有发表，对巴蜀符号的研究尚待更进一步。以上所论或有不当，尚祈大家指正。

注 释

- [1] 卫聚贤：《巴蜀文化》，《说文月刊》1942年第3卷第7期。
- [2] 刘瑛：《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见《文物资料丛刊》第7辑，文物出版社，1983年。
- [3] 高文、高成刚：《巴蜀铜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 [4] 管维良：《巴蜀符号》，重庆出版社，2011年。
- [5] 罗开玉：《晚期巴蜀文化墓葬初步研究》，《成都文物》1991年第3、4期。
- [6] 李学勤：《论新都出土的蜀国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1期。
- [7]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
- [8] 李复华、王家佑：《关于“巴蜀图语”的几点看法》，《贵州民族研究》1984年第4期。
- [9] a.孙华：《巴蜀符号初论》，《四川文物》1984年

- 第1期。
- b.刘豫川：《巴蜀符号印章的初步研究》，《文物》1987年第10期。
- [10] 冯广宏：《巴蜀文字的期待（一）》，《文史杂志》2004年第1期。
- [11] 四川省博物馆编：《巴蜀青铜器》第39页，成都出版社、澳门紫云斋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相同。
- [12] 《巴蜀青铜器》第38页。
- [13] 《巴蜀青铜器》第130页。
- [14]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第172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
- [15] 《巴蜀青铜器》第106页。
- [16]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光荣小区土坑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11期。
- [17] 成都市文物管理处：《成都市金牛区发现两座战国墓葬》，《文物》1985年第5期。
- [18]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市金沙巷战国墓清理简报》，《文物》1997年第3期。
- [19]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金沙遗址“黄河”地点墓葬发掘简报》，见《成都考古发现》（2012），科学出版社，2014年。
- [20] 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成都京川饭店战国墓》，《文物》1989年2期。
- [21]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凉水井街战国墓葬出土的青铜器》，见《成都考古发现》（2004），科学出版社，2006年。
- [22] 成都市文物管理处：《成都三洞桥青羊小区战国墓》，《文物》1989年第5期。
- [23]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商业街船棺葬》，文物出版社，2009年。
- [24]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十二桥遗址新一村发掘简报》，见《成都考古发现》（2002），科学出版社，2004年。
- [25] 《巴蜀青铜器》第126页。
- [26]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西郊石人小区战国土坑墓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4期。
- [27]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西郊金鱼村发现的战国土坑墓》，《文物》1997年第3期。
- [28]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西郊省水利设计院土坑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4期。
- [29]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市出土的一批战国铜兵器》，《文物》1982年第8期。
- [30] 《巴蜀青铜器》第148页。
- [31]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战国土坑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1期。
- [32] 四川省博物馆：《成都西郊战国墓》，《考古》1983年第7期。
- [33]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蒲江县文物管理所：《蒲江县飞龙村盐井沟古墓葬》，见《成都考古发现》（2011），科学出版社，2013年。
- [34] 四川省文管会等：《四川宝兴汉塔山战国土坑积石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9年第3期。
- [35] 杨文成：《四川宝兴出土巴蜀符号印等文物》，《文物》1998年第10期。
- [36] 四川省文管会、大邑县文化馆：《四川大邑五龙战国巴蜀墓葬》，《文物》1985年第5期。
- [37] 刘章泽等：《四川德阳罗江周家坝战国船棺墓地》，见《2012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3年。
- [38] 陈黎清：《四川峨嵋县出土一批战国青铜器》，《考古》1986年第11期。
- [39] 何泽宇：《高县从废品收购站拣选出一把巴式剑》，《四川文物》1984年第3期。
- [4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元市文物管理所：《广元市昭化宝轮院船棺葬发掘简报》，见《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 [41]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犍为县巴蜀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3期。
- [42]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犍为县巴蜀土坑墓》，《考古》1983年第9期。
- [43] 四川省博物馆、简阳县文化馆：《四川简阳出土的战国青铜器》，见《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
- [44]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越西县文化馆：《四川越西华阳村发现蜀文物》，见《文物资料丛刊》第7辑，文物出版社，1985年。
- [45] 周曰珽：《四川芦山出土的巴蜀文化器物》，《考古》1991年第10期。
- [46] 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天府藏珍》第48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
- [47] 何志国：《四川绵阳出土战国铜兵器》，《文物》1986年第3期。

- [48] 四川省博物馆王有鹏:《四川绵竹县船棺墓》,《文物》1987年第10期。
- [49] 四川省文管会赵殿增、胡昌钰:《四川彭县发现船棺葬》,《文物》1985年第5期。
- [50] 彭州市博物馆:《彭州文物撷珍》,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
- [51] 郫县文化馆:《四川郫县发现战国船棺葬》,《考古》1980年第6期。
- [52] 李复华:《四川郫县红光公社出土战国铜器》,《文物》1976年第10期。
- [5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渠县博物馆:《城坝遗址出土文物》,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 [5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文物出版社,2006年。
- [5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石棉永和墓地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06年第3期。
- [56]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双流县文物管理所:《四川双流县青桐村汉、唐、宋代墓地发掘报告》,见《成都考古发现》(2010)第459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 [57] 四川省博物馆、新都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第6期。
- [58] 刘瑛:《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见《文物资料丛刊》第7辑第18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
- [59]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宣汉罗家坝》,文物出版社,2015年。
- [60] 王琳琅、李晓清:《仪陇发现巴式铜剑》,《四川文物》2007年第1期。
- [61] 刘志岩:《四川宜宾沙坝战国至西汉墓地》,见《201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93页,文物出版社,2011年。
- [6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宜宾市博物馆:《考古宜宾五千年:向家坝库区(四川)出土文物选粹》第38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 [6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荣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荣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见《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 [64] 荣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四川荣经南罗坝村战国墓》,《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
- [65] 李晓鸥、刘继铭:《四川荣经县烈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考古》1984年第7期。
- [66] 四川省文管会等:《四川荣经曾家沟战国墓葬第一、二次发掘》,《考古》1984年第12期。
- [67]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0年。
- [68]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北碚区文物管理所:《北碚区庙嘴墓地考古发掘简报》,见《嘉陵江下游考古报告集》第240页,科学出版社,2015年。
- [69]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涪陵小田溪9号墓发掘简报》,见《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 [70]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涪陵点易墓地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10期。
- [71] 山东大学考古学系等:《开县余家坝墓地2001年发掘简报》,见《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第1440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 [72]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13·巴蜀》第132页,文物出版社,1994年。
- [73] 重庆市博物馆、复旦大学文博系:《万州麻柳沱遗址考古发掘报告》,见《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第513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 [74] 重庆市文化局等:《万州大坪墓群发掘简报》,见《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中卷)第799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 [75] 镇江博物馆等:《万州曾家溪墓地考古发掘报告》,见《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第996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 [76] 廖渝方:《万县又发现虎纽镞于》,《四川文物》1991年第1期。
- [77]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发掘报告》,见《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第275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 [78] 中国历史博物馆故陵考古队、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故陵楚墓发掘报告》,见《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第393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 [79]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东洋子遗址考古勘探发掘报告》,见《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第206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 [80] 《巴蜀青铜器》第103页。
- [81]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巴东红庙岭》第133页,科学出版社,2010

- 年。
- [8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博物馆：《荆门罗坡岗与子陵岗》第50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 [83] 湖北省博物馆：《宜昌前坪战国两汉墓》，《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 [84] 枝江县博物馆：《枝江近年出土的周代铜器》，《江汉考古》1991年第1期。
- [85] 秭归县屈原纪念馆：《秭归兵书宝剑峡悬棺清理简报》，见《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五卷第150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 [86] 张新明：《秭归县出土的几件青铜器》，见《葛洲坝工程文物考古成果汇编》第228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
- [87] 潜江市博物馆：《秭归何家岭、沙包岭墓地发掘简报》，见《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五卷第421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 [88] 同[86]。
- [89]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赫章可乐二〇〇〇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
- [90]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3~2013贵州基建考古重要发现》第92页，科学出版社，2015年。
- [91] 杨帆等：《云南考古（1979~2009）》第17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
- [92] 云南省昭通市文物管理所、云南省水富县文化馆：《云南省昭通市水富县张滩土坑墓地试掘简报》，《四川文物》2010年第3期。
- [93] 熊传新：《记湘西新发现的虎纽锿于》，《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
- [94]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Ⅱ·湖南卷》第180页，大象出版社，2006年。
- [95] 张建平：《桃江出土的虎纽锿于及相关问题》，见《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十一辑第310页，岳麓书社，2015年。
- [96]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天津卷》第117页，大象出版社，1996年。
- [97] 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省松桃出土的虎纽锿于》，《文物》1984年第8期。
- [98] 林奇、邓辉：《锿于刂议》，《江汉考古》1987年第4期。
- [99]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湖北卷》第88、89页，大象出版社，1996年。
- [100] 严志斌、洪梅：《战国时期巴蜀文化钟形符号的考察》，《四川文物》2015年第5期。
- [101] 严志斌、洪梅：《战国时期巴蜀文化壘形符号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11期。
- [102] 屈小强等：《三星堆文化》第46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 [103]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遗址星河路西延线地点发掘简报》，见《成都考古发现》（2008）第116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 [104] 廖渝方：《万县又发现虎纽锿于》，《四川文物》1991年第1期。
- [105] 同[94]。
- [106] 同[101]。
- [107] 同[100]。
- [108] 王仁湘：《巴蜀徽识研究》，见《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2年。
- [109] 同[101]。
- [110] 四川省文管会、大邑县文化馆：《四川大邑五龙战国巴蜀墓葬》图一九，《文物》1985年第5期。
- [111] 四川省博物馆、新都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图九，《文物》1981年第6期。
- [112] 同[57]。

（责任编辑 苗霞）

本期要览

福建明溪县南山遗址4号洞2013年发掘简报 南山遗址4号洞2013年的发掘,共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5座、灰坑8座、活动面4处、火塘12处和大量的文化遗物、动植物标本。遗址中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可分两期。此次发掘,第一次明晰了南山遗址4号洞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早晚关系,为完善闽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河南偃师商城宫城第五号宫殿建筑基址 偃师商城宫城第五号宫殿建筑基址叠压在第六号宫殿建筑基址之上,是在第六号宫殿建筑基址废弃后修建的一座与其风格迥异的夯土建筑。第五号宫殿由正殿,东、西配殿,东、西庑,南庑、门塾及中部庭院构成,呈现出类似“四合院”式布局。其年代为二里冈下层文化偏晚至二里冈上层文化偏晚阶段。

山东青岛市土山屯墓地的两座汉墓 土山屯墓地中的M6、M8,为带斜坡墓道的岩坑竖穴砖木混合椁室墓,葬具为重棺重椁,出土遗物有铜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骨角器等。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遗物,推断两座墓葬的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墓葬的发掘,为汉代鲁东南沿海地区墓葬制度、汉代地域文化及物质文化等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巴蜀符号述论 通过对现有考古材料的梳理,巴蜀符号有人形、动物形、植物形、器物形、建筑形、几何形等,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西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南北条状地带以及重庆至枝江的峡江地区,时代为战国初期至西汉早期。巴蜀符号有几种特定的复合性组合,其方向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并存,对它的讨论应当与器用联系起来。

辽西地区先秦时期马具与马车 马衔和马镡是最早出现的驭马用具。辽西地区先秦时期马具中的衔、镡连接方式有镡穿衔、衔穿镡、衔镡一体等三种。马镡除有控制马衔不能脱出马口的功能外,还起到将马衔与笼头连接起来的作用。辽西地区先秦墓葬随葬的马具、车器的数量及组合均比较固定。魏营子文化时期,马已被引进到辽西地区,主要用于驾车。